

重塑“原真性”城市：当代街道景观的符号表意分析

郭旭东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0）

【摘要】“原真性”城市是一种理想化的当代城市规划理念。“原真性”城市规划以街道空间为载体，其“原真性”意义的显现有赖于接受者对街道景观符号文本的意义解释，而街道设计者则可以通过符号文本的构造方式引导接受者的解释倾向。本文以成都崇德里街道为例，结合经验观察与报刊资料，从符号表意的双轴关系结构切入，探讨崇德里街道景观符号文本表意的双轴操作过程，解析了促成其“原真性”街道风格的文本构造方式。

【关键词】原真性；街道；符号表意；双轴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G05

【文献标识码】A

一、“原真性”城市及其街道空间

对一种理想的都市形态的探寻，始终是城市思想史发展的核心线索。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以技术为驱动的都市规划成为现代化运动的关键环节。有关都市规划的专门知识试图将现代城市建设成为一种同一性的、内部整齐划一的僵化空间，规划者将现代都市与前现代都市视为决计不可相容的两种都市形态，他们执着地拓宽都市中的街道，扩张都市的地理范围，同时拆毁老建筑和旧街区，驱赶、孤立流动于都市空间中的普通市民。这种“正统都市规划理论”所造成的后果，在瓦尔特·本雅明（2013：54）看来是“用伪造的艺术目标来高扬技术的必要性”，抹杀都市生活中“人”的因素。理查德·桑内特（2006：325）则认为这使“个人的身体在都市空间移动时，逐渐与他所赖以移动的空间脱离，同时也与在同一空间的其他人群分离”。

在人文主义都市研究者看来，重建都市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都市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重新发掘、塑造都市的“原真性”意象实现。莎伦·佐金认为，

【作者简介】郭旭东，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

城市的“原真性”具有辩证的含义，它既是“一种生活和工作的连续过程，一种日常体验的逐步累积，一种人们对眼前房子、身边社区每天依然如故的期待”（莎伦·佐金，2015：6），亦是“某种被精心选择的生活方式，一种表演，一种置换的方式”（莎伦·佐金，2015：4-5）。由此可见，佐金的“原真性”概念一方面体现了城市居民对一种稳定的生活秩序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可能被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有沦为城市规划者及其背后的政治、资本力量所利用的利益工具的风险。归根结底，“原真性”应被理解为一种社会产物，其实质是社会各阶层争夺空间分配权力的结果，市民、开发商、政府机构和城市规划者的诉求在“原真性”城市的塑造过程中汇集交合。

佐金为我们审视城市“原真性”提供了一种批判性视角，但她对当代城市更新的悲观态度，对城市化与日常生活氛围难以共存的前景的认识，亦使围绕城市“原真性”问题展开的探讨与实践陷入死角，对于满足城市居民对“原真性”城市的切实需求，及其摆脱城市空间中的权力支配阴影而言缺乏生产性。在本文中，“原真性”的含义一方面延续了佐金的定义，即一种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和长期的社会生活经验积累，另一方面则悬置这一概念的否定性意义，在保留“原真性”作为社会产物的定位的同时，积极地看待开发商、政府机构、城市规划者在建设“原真性”城市过程中扮演的肯定性角色。本文认为，佐金所谓的“外部力量”对于重塑“原真性”城市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应被一概否定，如今的城市更新活动已日益对城市居民的物质或精神需求加以重视，尤以立志于重塑“原真性”的城市更新活动最为突出。本文认同“原真性”的社会性、政治性、策略性意义，但认为对于城市文化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在现实语境中通过对“原真性”城市呈现方式的分析，透视当代城市居民“进入都市的权利”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的问题（亨利·列斐伏尔，2015：13）。

“原真性”城市所依托的具体场所是贯穿于城市空间中的若干街道。街道是城市生活和空间布局的重要依凭，也是城市规划理念具体的实践落脚点。简·雅各布斯是城市研究者中最知名的“街道中心主义”者，在她看来，街道是“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区域，是一个城市的最重要的器官”（简·雅各布斯，2006：26）。街道与城市相互依存，城市衍生街道，街道构成城市，城市生活以街道为中心，城市规划亦以街道为对象。在佐金那里，“原真性”正是城市街道“与生俱来的品质”（莎伦·佐金，2015：260）。由此可见，建设“原真性”城市的主要阵地正是密布于城市组织中的街道，唯有通过对街道景观的改造，“原真性”才得以在现实中显现。因此，若想观察当代城市如何重塑城市的“原真性”面貌，则街道便是不可或缺的一扇窗口。对“原真性”街道的研究，其价值便体现在为普通民众、城市设计者和相关机构提供一种认识和组织城市空间的新视角。

基于此，本文将成都崇德里街道作为一种“原真性”街道的理想形式加以考察，它

体现了“原真性”街道的基本构造原则，兼具日常性与功能性的公共街道属性，同时也混合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设计风格和景观特点。因此，尽管对崇德里街道的分析是一种限于局部的分析，但我们仍然能从崇德里这一个案出发透视“原真性”街道的一般性表现，从理论上阐释“原真性”城市的重要内容。

二、崇德里街道符号文本的双轴操作分析

崇德里街道地处成都市锦江区中心区域，北起东大街，南接红石柱横街，现址北侧为2014年开业的太古里商业购物街区，附近一带属大慈寺片区核心保护范围。追溯崇德里历史，它原本是一条“无名小巷”，清代时为协台衙门所在，“1925年，有一位名叫王崇德的商人在此建房，并把小巷命名为‘崇德里’”（袁庭栋，2010：1042）。实施旧街改造之前，崇德里的格局主要经过三次变化，其“原有墙分为两段，抗日战争时期，打通墙界，分前、后里。1981年地名普查时合并命名”（吴世先，1992：354）。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崇德里曾作为进步组织“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办事处所在地，以及川西地下党组织创建的“川西边地下党留蓉临时工作部”所在地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成都，左翼作家李劫人亦曾在此进行革命活动（郭志强，2008：185）。2013年，成都市将崇德里纳入新增的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项目中（辜波，2014）。2014年初，崇德里的旧街改造工作基本完成。

相较于成都其他旧街，崇德里虽占地面积不大，但其地理位置接近太古里、春熙路商圈，又位于成都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的大慈寺保护区核心地段，因此对崇德里街道的改造对于改善周边地区的营商和消费环境均有重要意义。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崇德里街道已经长期未经修缮，街道内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老建筑亦已残破不堪。在实施旧街改造前，崇德里的房屋类型主要为居民住房，历史上，杨天鹏（成都骨科医院创始人）、李行百（著名画家）、刘成基（川剧丑角泰斗）等成都各界名人曾在此居住（温志航，2015）。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原住民陆续搬出，街道上的住房年久失修，崇德里日益没落。2010年，当《华西都市报》记者深入崇德里采访时，其多数院落已被用作出租屋，但实际在此居住的人却已不多（刘春梅，2010），且居住环境十分恶劣。直至2011年，崇德里街道还未通天然气，以至于居民“洗澡只有用蜂窝煤烧水……一到下雨天，瓦房四处漏水”，用崇德里老住户的话说，“住在这儿时，每天想的都是搬出去”（熊筱伟，2014）。因此，改造崇德里对于改善此地的民生环境、保护街道内的历史文化遗产而言可谓意义重大。

正是在以上描述的背景下，成都市政府、锦江区政府开始积极推进崇德里街道的旧街改造工作，并将改善周边环境、保护历史遗产作为改造工作的核心诉求，将“有机更新”作为改造工作的最终目标。换句话说，崇德里街道改造一改“过去把城市破败的

房子全部拆掉，修崭新房子的通行做法”，而“尽可能地保留原建筑的一砖一瓦”，让“时间和历史成为这里最好的装饰”（王笛，2019：381）。由此可见，崇德里街道的“有机更新”契合了重塑“原真性”城市的理念，即在赋予老建筑以现代化建筑的基本功能和坚固构造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整条街道的历史面貌和日常生活氛围。

（一）作为符号文本的街道：崇德里的可读性

崇德里街道空间的“原真性”元素，集中体现在其街道景观的设计之中。街道景观是城市规划者的城市更新理念的缩影，人们常常能够透过街道景观理解一座城市，借由不同街道景观的串联感受一座城市的城市意象。在此意义上，街道景观，正如迈克尔·德·塞托所言，“将城市的复杂性变得可读，并且把城市中模糊不清的流动固定成一纸透明的书页”（迈克尔·德·塞托，2009：169）。这一“可读的城市”使城市及其街道空间不再局限于自身的物质性存在，而是成为广义的文本分析的对象。在此意义上，广义的符号学研究便可将物质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察，如街道这一物质空间便可被视为一种符号表意组合，“让接受者能够把这个组合理解成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赵毅衡，2016：42）。与此同时，在空间理论研究者爱德华·苏贾看来，符号与空间的联系亦表现在“符号的”（semiotic）或“符号学的”（semiology）希腊文词根 semeion 的本意中——即指“一个特定的地方”，在此基础上，现代城市在苏贾那里被“解构为一种令人困惑的符号拼贴……这些符号宣传了常常充其量只不过是各种假想的社区以及对城市地区各种奇特的表征”（爱德华·苏贾，2004：367）。综上所述，崇德里街道景观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符号文本，并借助符号学的理论工具进行阐释。

但应当注意的是，“符号文本的意义，是由解释者决定的，文本是解释观照的对象”（赵毅衡，2017：129）。因此，尽管本文论述的重心是对崇德里街道景观设计者的符号表意活动的考察，但街道景观最终被解释为怎样的意义，则由解释者的立场而定。对于改造后的崇德里街道而言，其解释者主要是进入崇德里街道的游览者，他们是崇德里“原真性”意象所面向的核心群体。这是因为，改造后的崇德里街道主要作为一处集餐饮、住宿等功能于一身的休闲消费场所面向公众，在公众眼中，崇德里街道更多被视为能够唤起“老成都”日常生活记忆的一处旅游目的地。相较于长居在此的居民而言，游览者对崇德里街道“原真性”的期待在于能够在此获得脱离现代生活而融入“老成都”悠闲生活氛围的短暂休憩。游览者的高度流动性使其不会如居民一般希冀在街道中维持一个稳定、长期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改造后的“崇德里”街道“原真性”风格的表现形式，也就与以保留原住居民为前提的旧街改造有所不同。

基于此，本文的分析便尝试从一个解释者/游览者的视角出发，提供一种针对崇德里街道景观符号表意的可能性解释。在此解释过程中，本文探讨的问题是街道景观符号文本携带着哪些要素以及街道景观构成文本的方式，换句话说，即街道景观符号文本

“引导或促使接受者（游览者）提供某种解释”的方式，而本文聚焦的将是这类“引导”方式中的一种，即“文本符号组成中的聚合轴显现，它们透露了文本选择组合的过程”（赵毅衡，2017：130），这一文本选择组合的过程，便是符号文本表意活动中的双轴操作过程。

所谓符号双轴操作，指的是符号文本通过在组合轴与聚合轴上的再现（组合）与选择（聚合）活动，为文本赋予特定意义。组合轴上的操作“就是一些符号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的方式”，聚合轴上的操作“是符号文本的每个成分背后所有可比较，从而有可能被选择，即有可能被选中的成分的各种成分”被“选择”或“选中”的过程，“任何符号表意活动，小至一个梦，大至整个文化，必然在这个双轴关系中展开”（赵毅衡，2016：156）。在此基础上，包括崇德里街道在内的“原真性”街道的景观设计要求设计者在具有城市“原真性”特色的聚合轴上选择可利用的文本资源，并将之组合为一种在接受者那里具有“原真性”意味的街道景观。当我们对街道景观符号文本进行阐释时，既要理解其组合方式的构成思路和形式，同时也应当深入到对其隐含的、在其选择对象之外的聚合系列的观察与揭示——在这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设计者为何在聚合系列中选择以某一因素作为街道“原真性”的引导标识呈现给市民，而非其他。如赵毅衡（2016：157）所言，“深入理解，就是朝文本背后隐藏的聚合系探索，就是探索文本的构成原因”。因此，对街道景观符号文本的阐释，就必须深入到文本聚合系列——“原真性”的城市文化背景之中探寻。

需要说明的是，街道景观规划者/设计者的聚合操作过程，是隐藏的而非如组合操作那般能够明示，因此他们选择聚合轴中某元素进入符号文本的意图我们无法真正辨明。在本文对崇德里街道景观的符号学分析中，所采用的分析方式是从一个游览者的视角出发，结合自身经验观察与相关报刊资料，由街道景观符号文本的“再现”尝试回溯规划者/设计者的聚合操作过程，这种回溯的目的在于接近事实，而非还原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崇德里这一个案的分析是一种“后见之明”式的局部分析，这种分析的意义在于丰富认识问题的视角，并从中探索出“原真性”街道符号文本表意的一种可能的构造方式，这对于认识其他“原真性”城市景观的文本表意而言具有积极意义。

（二）“原真性”再现：崇德里街道功能分区的形成

与成都以往的旧街升级改造项目不同，崇德里改造“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旧址的原貌”，同时设计师团队还采取了“中西合璧”的设计方案，使崇德里在保留历史原貌的基础上亦能吸引“国际化精英”入驻（唐泽文，2014）。主持崇德里改造项目的设计师王亥将其设计思路概括为“一是对传统进行保留，保护现状本身是改造前提，二是实现老院落功能性的转变，恢复其建筑功能，使其能够满足现代生活使用”（李颖，2014）。从符号文本表意机制的角度解析，这种设计思路一方面在聚合层面开发出崇德

里街道的历史文化潜力，使其在游览者那里呈现出“原真性”的风格特色，另一方面则从现实的功能需求入手，在组合层面利用文本构成规则将这种“原真性”特色在游览者的体验中具体化。

实际上，崇德里的升级改造从一开始便得力于崇德里居民、游客、规划者/设计者、开发商和政府机构的沟通协作。一方面，崇德里居民积极配合政府的搬迁计划，正式完成搬迁仅用了三个月时间，而原以为将被拆除的老建筑得到保留，居民和游客亦能在此寻回“老成都”的生活记忆；另一方面，尽管承担项目的设计者在具体规划崇德里项目时握有主动权，但开发商和政府机构对其理念的认可以及资金筹措无疑为设计者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四川日报》的一篇报道便介绍了开发商、政府机构在规划崇德里项目之初的想法及其筹措资金的措施：“通过公开征集改造方案，锦江区尝试着以文化为‘卖点’，引入社会资本实行BOT模式的开发：即由企业投资改造、经营该棚户区，经营20年后将经营权交还政府。2012年5月，成都崇德故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元，在保留建筑外貌的同时，对内部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和修葺。”（熊筱伟，2014）由此可见，原住居民的积极配合、游客需求的有效落实，以及政府机构和开发商对设计师理念的认可和支持，共同成就了作为成都旧街改造范本的新崇德里街道。正如莎伦·佐金（2015：276）所言，“重塑原真性开始于创造出一种能够将起源的审美观和新开端的社会观相连接的形象”，因此重塑“原真性”城市需要地方文化与国家、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需要将现代化的城市改造与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

崇德里街道的“原真性”风格首先凸显在其空间布局之中，其空间布局又以街道内部的功能分区为基础。从崇德里的空间布局之中，游客能够鲜明地感受到老成都“原真性”生活氛围在旧街改造中的留存。崇德里的三个主要空间包括“谈茶”“吃过”和“驻下”。仅从这三处空间的命名便可知晓，崇德里空间布局的规划意图，在于引导游客在游览崇德里时，能够在此感受到具有成都特色的日常生活氛围。

从符号文本表意的角度来看，设计者在聚合轴中选择了饮茶、美食和居住三种“老成都”生活元素，并将之组合在崇德里的街道空间之中。在设计者看来，这三种元素在“老成都”生活记忆中最具代表性：成都是知名的饮茶之都，早在民国时期，“成都茶馆之多”，便“为全国之冠”（陈茂昭，1983：178），乃至有“一城居民半茶客”的民谚；成都亦是全国闻名的美食之城，“天府之国的正宗川菜及精美小吃制作精良，品种丰富，色、香、味、形俱佳……在国内外均享有很高的声誉”（王大煜，1988：182）；成都的生活居住氛围亦早已为人称道，其悠闲的生活氛围有时甚至成为被批评攻击的对象，如民国时期某期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便“揭露”成都的生活环境“良好得使你走向懒惰的路上去”（余冰魂，1936），但这种悠闲甚至有些懒散的生活氛围在当下却十分难觅并令不少人趋之若鹜，故而成为成都文化传播的一面旗帜。正是基于以上

原因，崇德里改造的设计者在打造崇德里空间布局的符号文本时，在“老成都”生活和记忆的聚合轴中选择饮茶、美食和居住作为典型元素加以组合，由此引导接受者将崇德里视为能够体现成都“原真性”特色的一处街道空间。

当游客沿着设计者的空间布局进入崇德里街道时，具有“原真性”引导标识的街道景观符号文本可谓俯拾皆是。崇德里的房屋建筑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形态和结构，甚至于“连一根柱子都没取下”，建筑墙体也大多保留原貌，“院落内镜钯街改造的墙体，90年代的墙体，和最原始的墙体都得到保留，这就是一个时间综合体的呈现”（李颖，2014）。这些90年代的墙体是设计师有意保留的建筑原址特色。在对崇德里进行修缮、改造的过程中，尽管房屋内部往往被大幅度地加以改造，并且设计上也体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风格，但房屋外部的围墙，设计师所做的改动则很少，呈现在游客面前的大多是墙壁本身残留下来的面貌。

从符号表意机制的双轴操作角度来看，设计师之所以在房屋内、外部设计上有如此不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考虑到了作为街道景观的观察者、解释者的游客的感受。对符号文本的解释离不开受众的视角，当游客进入崇德里街道，斑驳的墙壁实际上构成崇德里特色酒店、餐厅这些功能性场所的“伴随文本”，它们引领游客进入“老成都”生活、记忆的语境，游客由此得以意识到自己身处于崇德里街道这样的“场合”，当他们进而在酒店、餐厅消费时，所获取的不仅是优良的吃、住服务，更能体会到“老成都”生活的独特气氛。如赵毅衡（2016：179）所言，“既然世界充满了符号行为，那么没有一种符号行为可以独立表意，都不得不受先存的或共存的其他符号行为的影响”，在此意义上，崇德里“谈茶”“吃过”“驻下”空间中特色经营场所的符号表意，都离不开街道两旁斑驳墙壁营造的语境——它在某种程度上亦可称之为崇德里街道符号文本的“体裁”，引导着接受者“应当用何种方式解释眼前的符号文本”（赵毅衡，2017：130）。

（三）聚合与组合：崇德里街道空间的符号表意模式

“谈茶”空间是崇德里三种空间分布中保留原建筑特色元素较多的一处空间。崇德里街道的建筑风格一向被视为传承了“川西民居”的建筑特色，即“小青瓦、大出檐、小天井”“多采用穿斗式构架”“门窗多以木质”“内外空间多用院坝、檐廊、影壁、开敞的罩、通透的隔断进行联系”等等（董文英、周波，2012）。以茶室为核心的“谈茶”空间较好地保留了这种川西建筑特色。游客进入茶室后，能够看到阳光透过天井直射入茶室中心的过道，过道两边的茶座和方桌均采用传统中式风格。茶室采用大开间结构和高层高设计，屋檐保留传统穿斗式构造，支撑房梁的木质梁柱得到完好保留，这些梁柱均已近百年历史，“现在还能看到表面颜色不一的木头补丁，只能把柱、梁、樑头的腐坏部分去掉，嵌一块新木头进去恢复功能，梁实在不行才加根新的”（葛维樱，

2014)。游客在茶室中饮茶时可以近距离接触这些历经光阴洗礼的梁柱，感受“老成都”的历史记忆。“谈茶”空间的设计思路隐含着一一种聚合—组合的双轴操作过程，设计者首先将其可以选择的聚合系列范围限定在崇德里街道原有的“川西民居”建筑风格之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址固有的建筑元素，从天井、屋檐、梁柱到家具的使用都遵循了川西建筑特色，而当设计者将这些建筑元素巧妙组合在同一空间之中时，游客便可在此感受到“老成都”日常生活悠然闲适的意蕴所在。

“吃过”空间的设计同样注重于保留建筑原址的“川西民居”风格，但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颇为大胆的创新。“吃过”空间的设计者为该空间的符号表意赋予了更多人文因素，在“老成都”文化的聚合系列中选择了其中最能体现城市“人情味”的部分。同“谈茶”空间一样，以私房餐厅为核心的“吃过”空间保留了具有川西建筑特色的小天井，由此在餐厅内部形成了一条阳光通道，保证了餐厅整体的采光效果。而川西院落中的天井，原本便是院落居民之间见面、寒暄、交往的空间，窄小的天井恰恰成为老成都居民之间凝聚关系的媒介。在建筑师看来，“天井作为积极活跃的因子穿插于建筑群体之中，以它们的‘虚’来给予……居住者生活体验的‘真实’”，“作为建筑体中的‘虚’的矩形空间，它联系着房间、门等要素，也联系着人的感情，成为空间与感情的重要表达场所”（周洁、陈一等，2012）。实际上，“吃过”空间的命名本身便反映出设计者对街道空间中人文因素的关注，因为“吃过没有”正是老成都街坊邻居间常见的一种问候方式。“吃过”空间的厨房区域也采用了开放形式，食客可方便地与厨师和其他食客亲密互动。不难发现，崇德里设计者对“吃过”空间的设计极为关注空间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是“老成都”传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老成都”成为一座充满“人情味”的城市，“只有成都，才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谊”（何满子，1999：254）。

崇德里的“驻下”空间原为20世纪90年代的教职工宿舍楼，如今已被设计师改造为具有崇德里特色的酒店住宿空间，其内部结构、设施在根据现代生活需要进行大幅调整的同时，也比较注重街道“原真性”意味的保留。“驻下”空间的客房按照标准化的现代酒店客房形式设计，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客房邻近老居民楼，游客站在窗口抬眼便能看到对面居民楼老旧的墙体外观，以及居民晾晒在楼外的衣服，日常生活气息十分浓厚。设计者也注意保留了原教职工宿舍楼的建筑元素，如“崇德里教工住宅楼；建筑面积：七百二十平方米”之类的墙基字体在改造中便得到保留。由此可见，一方面，“驻下”空间的整体设计，特别是其客房内部设计凸显了设计者对现代空间功能性的追求，另一方面，设计者通过拉近“驻下”空间与附近老居民区的距离，在保证空间功能性完备之外又赋予其接近“老成都”日常生活氛围的一面。从符号表意过程的角度来看，“驻下”空间的设计者拥有更开放、多元的聚合系列选择范围，在此基础上，历时性与

共时性元素得以在“驻下”空间内交叉融合，互为呼应。这与雅各布斯所呼吁的在旧建筑中培育“多样性”的“混合用途”的做法正相契合，“旧建筑开发了一种用途，如果没有它，这种用途就根本不会产生”（简·雅各布斯，2006：177）。

在对崇德里三种功能分区的聚合—组合操作进行过具体分析之后，我们还可从符号表意的宽幅/窄幅现象入手，进一步探讨崇德里街道景观的符号表意特征。所谓宽幅、窄幅依据文本背后的聚合段宽窄而定。以旧街改造为例，一些街道因其本身的修筑时间长、历史文化特色突出，整体结构不易更动，设计者能够自由选择的聚合系列范围较窄，其表意呈现出窄幅特点；而另一些修筑时间相对较短、历史底蕴较为单薄的街道，对于设计者而言可选择的聚合系列范围更宽，因其不必受时空语境的过多约束，可自由选择的文化元素也就更多，表意则最终呈现出宽幅特点（赵毅衡，2016：160）。由此出发，街道景观设计的风格差异亦普遍存在，且因不同街道双轴偏重的不同而不同。当街道设计偏重组轴时，其符号表意便呈窄幅特点，当街道设计偏重聚合轴时，其符号表意便呈宽幅特点。在罗曼·雅各布森看来，前者体现为转喻性风格或现实主义风格，后者则体现为隐喻性风格或浪漫主义风格，“转喻通过相邻派生以达到写实效果，而隐喻则通过词汇变化以达到想象或者超现实的效果”（约翰·费斯克，2008：83）。

能够在游览者那里体现出“原真性”意义的城市街道景观，往往因设计者之设计理念不同而表现出或转喻、或隐喻式的符号文本风格。崇德里街道的三种功能分区，其符号文本风格的表现便各有不同。如“驻下”空间改造自历史相对较短的教职工宿舍楼，这使设计者在对该空间进行改造时并无太多来自时空语境的束缚，能够选择的聚合因素更为广泛、多样，由此造就了“驻下”空间充满想象力的设计方式，即在保证空间内部现代化设施功能完善的同时，拉近现代建筑与老旧民居的距离，这种隐喻性的表现形式彰显出“驻下”空间独特的“原真性”意味，形成了一种偏聚合轴的、“浪漫主义”的符号文本风格；相对于“驻下”空间，“吃过”和“谈茶”空间的聚合系列选择范围较窄，它们的房屋结构均已有近百年历史，所以当设计者本着打造“原真性”街道的想法设计两处空间时，在其外观和内部结构方面的改动空间并不大，从两处空间呈现的效果来看，设计者基本保留了原建筑的“川西民居”特色，除了一些必要的加固和改善之外并无太多超出原有建筑聚合系列的表现元素，由此两处空间也就最终呈现为偏组轴的、“现实主义”的符号文本风格。尽管崇德里三种功能分区表现出的符号文本风格互有差异，但其意义追求则十分统一，即从不同的角度和理念切入，引导游览者感受到“老成都”街道正在消逝的“原真性”，在现代规划实践中保留和发展城市的古老传统和集体记忆。

综上所述，崇德里街道空间的设计实践如同任何一种符号表意活动一样，可以在双轴操作的基础上剖析其表意过程。设计者在设计街道景观符号文本的过程中，在程度不

同的聚合系列选择范围影响下，通过符号文本聚合轴上的“选择”操作与符号文本组合轴上的“再现”操作，塑造出了街道空间内部不同的符号文本表意风格。而在崇德里改造的案例中，无论其内部三种功能分区的文本风格有何差异，它们的共同旨归都在于重塑城市街道的“原真性”，推动“老成都”日常生活特色在现代化城市中的延续。

三、结语

如今的崇德里已经成为成都一处重要的城市地标。在成都整齐划一的现代化城市景观中，“中西合璧”、以保留传统取胜的崇德里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标出项”。文化中的“标出项”是“异常的，边缘化的”，在这里风格成为一种标出特征，而“风格是一种感觉，无法以形态为绝对标准”（赵毅衡，2016：279）。因此，尽管改造后的崇德里街道仍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是规划者/设计者、开发商和政府机构干预下的社会产物，但其“原真性”意蕴的保留却使街道空间带给游览者的感觉区别于这座城市整体的意象，形成了自身标出性的独特风格。由此，改造后的崇德里街道便能够引导游览者认同其“原真性”风格，肯定其保留老街道“灵魂”的积极意义。

此外，由于双轴操作的文本构成方式不同，崇德里街道内部不同的功能空间“谈茶”“吃过”“驻下”在游览者那里呈现出了具有差异性的风格面貌。而在崇德里街道中，无论何种风格的空间符号文本，最终指向的目标都是引导游览者体会到街道景观设计中的“原真性”意味。如佐金所言，“我们必须从人类的角度来达至对原真城市的新认识”（莎伦·佐金，2015：288）。

从“人”的角度出发重塑“原真性”城市，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空间理论家的共同理想。列斐伏尔说，城市应该成为供人“栖居”的场所，用“和谐与‘人的尺度’”取代“理性一致性的标准”（列斐伏尔，2018：75）。在他看来，在“理性一致性”的城市规划中往往没有生活于城市中的普罗大众的位置，那正是他所要批判的被增长主义、抽象理性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城市。桑内特则认为，城市中的公共空间的“本性”在于“沟通人群、拓展活动”，换句话说，公共空间的意义在于维系社会关系，但以摩天大楼为标志的现代公共空间，却使人与人、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在城市中遗留下一个“死的公共空间”（Richard Sennett，2002：12）。在这个意义上，改造后的崇德里街道空间可以说正是桑内特眼中公共空间应然的表现形式，崇德里的设计者通过对日常生活氛围的有机营造，在崇德里空间内连接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了人与人、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此外，重塑“原真性”城市的实践还需要以居民、游览者为代表的普通民众，同以设计者、政府机构和开发商为代表的政治、资本力量之间的有效协作。重塑“原真性”城市的实践既不能被政治、资本力量主导，沦为理性一致的城市化进程的构成单元，亦

不能全然被普通民众保存集体记忆的诉求垄断，阻碍建筑空间本身的改善提升。如列斐伏尔（2008：15）所言，城市重建“不可倒退（沿袭传统城市模式），但也不能莽撞行事，把城市建成大而无当、杂乱无章的瓦砾堆”，对“原真性”城市及其街道空间的重建同样如此。

参考文献：

- 爱德华·W. 苏贾(2004). 后现代地理学[M]. 王文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陈茂昭(1983). 成都的茶馆[A].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C]. 内部发行.
- 董文英, 周波(2012). 川西民居建筑社会形态构成中的文化环境[J].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4): 238-241.
- 葛维樱(2014). 崇德里：一个城市的回家路[J]. 三联生活周刊(51): 85-89.
- 辜波(2014-01-03). 保护老建筑虫蛀的木头也留下[N]. 成都商报(6).
- 郭志强(2008). 下东大街崇德里三号秘闻[A]. 锦江记忆[C].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何满子(1999). 蓉城忆往[A]. 曾智中, 尤德彦编. 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C].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 亨利·列斐伏尔(2008). 城市化的权利[A]. 胡敏, 译. 城市文化读本[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亨利·列斐伏尔(2015). 空间与政治[M]. 李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亨利·列斐伏尔(2018). 都市革命[M]. 刘怀玉, 张笑夷, 郑劲超, 译.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简·雅各布斯(2006).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金衡山,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李颖(2014-01-23). 融合东西方元素改造崇德里[N]. 成都日报(13).
- 理查德·桑内特(2006). 肉体与石头: 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M]. 黄煜文,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刘春梅(2010-05-07). 记忆雨打风吹去 崇德里小巷深几许[N]. 华西都市报(23).
- 米歇尔·德·塞托(2009). 日常生活实践: 1. 实践的艺术[M]. 方琳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莎伦·佐金(2015). 裸城: 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M]. 丘兆达, 刘蔚,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唐泽文(2014-01-27). 崇德里旧城改造留住老成都记忆[N]. 四川日报(15).
- 瓦尔特·本雅明(2013). 巴黎, 19世纪的首都[M]. 刘北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大煜(1988). 川菜史略[A].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八辑)[C].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王笛(2019). 消失的古城[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温志航(2015-09-06). 崇德里: 老成都抗战文协所在地[N]. 华西都市报(10).
- 吴世先(1992). 成都城区街名通览[M]. 成都: 成都出版社.
- 熊筱伟(2014-06-08). 崇德里棚改“一箭双雕”[N]. 四川日报(1).
- 余冰魂(1936). 成都的茶馆[J]. 西北风(11): 45-46.
- 袁庭栋(2010). 成都街巷志(下卷)[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 约翰·费斯克(2008). 传播研究导论[M]. 许静,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2016).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2017).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周洁, 陈一, 周波, 李旭东(2012). 川西民居天井空间的精神及其启示——乐山市雷畅故居天井空间分析[J].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4): 235-237.
- Sennett, R. (2002). *The Fall of Public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 Zukin, S. (1995). *The Cultures of Citie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but media studies, which was often misunderstood as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media-centered argument, haven't responded to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m has been increasingly reflected and challenged in STS. Theories such as autonomous technology, ANT and affordance reflect on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make new theoretical elaborations on the agency of technology, which diverge from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They provide valuable resources for more accurate theoretical positioning of media studies.. The crossover between STS and media studies can help us bridge the gap between media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break the anthropocentric position, and understand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in the multifaceted and dynamic relationship constructed by different actors, which will advance our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human existence and civilization.

[Keywords] technical system; ANT; affordance; anthropocentrism

95 Recreating Authentic City: A Semiotic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Street Landscape

• *GUO Xu-dong*

[Abstract] Authentic city is an idealized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urban planning. Authentic urban planning takes the street space as the carrier, and the meaning of authentic street depends on the mean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miotic text of street landscape by the receivers, while the street planner can guide the interpretation tendency of the receiver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miotic text. Taking Chongdeli street in Chengdu as an exa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ouble-axis relationship structure of semiotic expression, this paper combines with empirical observation and newspaper materials, then discusses the double-axis operation process of semiotic text meaning of Chongdeli street landscape, and analyzes the text construction mode that contributes to its authentic street style.

[Keywords] authenticity; street; semiotic meaning; double-axis relationship